

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研究：层次及内容分析

傅荣贤

摘 要 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研究包括三个命题：“文化中的图书馆”从语用层面上强调文化背景对图书馆的前提地位，多元文化必将导致图书馆学研究的多元化，由此，建构中国图书馆学遂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图书馆作为文化”从语义层面上思考图书馆所表征的文化理念，由此，图书馆技术或现象背后的文化隐含遂成为关注焦点。上述两个命题的实质是强调图书馆与文化之间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彼此对应关系，而“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兼及语义和语用，强调图书馆不仅反映文化或为文化所反映，而且能够改变文化的现有面貌，引领文化的应然走向，具有能动性特征。文化视角虽然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和致思路径，但并不能取代基于语法层次的图书馆学的本体研究。参考文献 12。

关键词 文化视角 图书馆学 图书馆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consists of three propositions: From pragmatic level, “Library in Culture”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to the premise status of library. Multi-culture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library study. As a resul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became a problem in the proposition. “Library as a culture”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ideas that library expresses from the semantic level. So, the implicit culture in the library technology and the library phenomenon became a focus of attention. The substa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propositions is to emphasize the reflected and being reflected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library and culture.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 takes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emphasizing that the library not only reflects the culture or it is reflected by the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library changes the existing culture, leading culture to what it ought to be, with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we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s and thinking path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ntology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syntax can not be replaced. 12 refs.

KEY WORDS Cultural perspective.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CLASS NUMBER G250

在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 1911 – 2010 年为时间跨度，精确查找篇名中同时包含“图书馆”与“文化”的论文共有 3001 篇，同时包含“图书馆学”与“文化”的论文仅有 20 篇。检索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2 日。“3001”和“20”之间的巨大落差显示，尽管图书馆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未构成业界的学术自觉。由于缺乏基于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理论成果的有效指导，对图书馆与文化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迄今尚停留

在现象比附和简单对应的层次上。我们认为，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研究，应该聚焦于下述三个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命题。

1 文化中的图书馆

1.1 文化视角缺失的图书馆学研究

缺乏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只研究图书馆文本(text)而不研究图书馆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语境(context)，形成一种无视上下文的“提纯”

研究。但是,“图书馆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归属于产生它的文化”^[1]。文化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相应地,图书馆也应该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然而,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ISO/TC46)制定的各种分类标引标准、文献数据库标准、文献生产与代码标准、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等等,都是以全球图书馆在业务运作上的单一化为取向的。这一取向预设图书馆并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我们的图书馆”和“他们的图书馆”之间的相应性差别。观念层面上的趋同,与技术标准的单一化如影随形。例如,“知识自由”只反映西方国家的认识,中国特色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中国图书馆也主要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而不是“民主武器”^[2],但“知识自由”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却在成为主流话语。

吊诡的是,撇开文化语境研究图书馆,这一取向向本身就是近现代西方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由此导致对“提纯”研究的自我否定。众所周知,近现代图书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3]。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学一方面把关于文献之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技术知识确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排除与业务技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文化背景。例如,1807年首次提出“图书馆学”的德国学者施雷廷格“关注更多的是图书馆目录编制的问题”,美国人杜威的DDC则是这一关注焦点的突出成果,而“西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杜威法在图书分类技术方面的突破”^[4]。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主客二分和理性逻辑。例如,DDC将文献当作纯粹的客体,要求主体人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单纯从文献的形态特征、学科属性、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等“客观”因素来分类和组织文献。因此,DDC只研究人工符号在语法层面上的形式结构规律,而不涉及到语义层面上的符号(能指)与内容(所指)的关系问题,也不涉及到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语用内涵。其基本思路是,形式化的语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个人或社会的意志,具有可分析性和可把握性,而涉及符号内容的

语义和涉及符号使用者的语用是不可把握的。无疑,上述有关1807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亦即,既然研究内容是客观的,那么研究这一客观对象的方法手段也应该是理性的。由此形成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其目的就是要“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5]。这样,一千个图书馆可以共享同一个思想体系、概念框架和技术标准,由此开启了一个世界图书馆的同质化时代。

综上,针对图书馆学研究长期缺乏理论和方法的“自足性”,施雷廷格、杜威以来的图书馆学家一方面在“什么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的确认上义无反顾地撇开了文化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在“什么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路径”的确认上果断地排除了非实证主义方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对作为独立学科的图书馆学的普遍性和同质化阐述。这是对此前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文化领域中的“反动”,并最终改变了图书馆学作为历史文献学、政治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的命运。但问题是,文献组织是离不开语义和语用的。同样,图书馆也只能是“语境化产品”,剥离了图书馆的文化血脉而获得的任何“科学”认识,都回避了现实图书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2 “文化中的图书馆”的研究内容

同质化导致的图书馆在品种和类型上的贫乏,意味着人类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模式的单一化,它极有可能导致人类文献能力(诸如文献的生产、交流和利用能力)的衰弱,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文化的成长。当今世界,肯定和保护文化的差异性和相对性,已成为人类的共识。相应地,不同文化中的图书馆也应该是差异性和相对性的存在。这就需要在文化多元化的理念下,颠覆“精于求同,疏于别异”的研究模式,在自觉自为的认识层次上,研究不同图书馆的个性化特征。

1.2.1 图书馆学理论也是“文化中的”

作为对图书馆现象的理论总结,图书馆学也将因“文化中的图书馆”而成为“文化中的图书馆学”。没有脱离文化的图书馆学,一如没有脱离文化的图书馆。这就需要我们z从文化背景

的高度对现有图书馆学理论成果进行重新审视。例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程,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西方世界,从而逐渐形成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学派”,而“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其社会学研究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当时芝加哥大学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巧合的是,社会学中也有一个芝加哥学派,它与图书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相互辉映,适成对照”^[6]。它启发我们,图书馆学理论对文化背景是高度依赖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相关语境,即可能存在效度性质疑。例如,源自西方的图书馆学是否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图书馆的实践?如果不能,中国图书馆学应该如何彰显自我价值自觉,而非竞相效尤西人揭橥之原理?

1.2.2 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期待“中国制造”的独特的图书馆学

把图书馆放到文化环境之中,不仅使研究获得一种多维度和系统化的全息性观照,更意味着同质化和普遍性不再是图书馆应有的基本特征。具体到中国语境,作为中国文化产物的中国图书馆学的个性特点应成为我们的思考重点。所谓“中国图书馆学”,就是要以“中国图书馆”的事实为依据,构建“中国制造”的、对中国图书馆实践具有理论解释力的话语体系。我们相信,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而背景是不能“拿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采取“拿来主义”,是典型的缺乏文化视野的表现。而强调“中国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本质上就是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图书馆(学)的重要作用。例如,我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兼掌国家高等教育、清末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直接由当时的“学部”(国家教育部)领导,《中图法》将“图书馆(学)”分在“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大类等等,说明中国语境下的图书馆是定位在促进社会教育和科学文化之上的,可谓渊源有自、颇具特色,有关中国图书馆的“教育”理论只能自我构建而无法直接学舌西方。

1.2.3 “文化中的图书馆”强调对图书馆“特例”的研究

“文化中的图书馆”命题不仅表征宏观和地

域意义上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差异,也表征特定文化背景下具体的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上的个性化。现实中,图书馆的所有操作总是和它的操作目的联系在一起,而目的是“上下文”的组成部分,不存在一个非语境化的独立的关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现象与行为。现实中的图书馆及其文献操作形式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在提纯后的“同质秩序”和当下的“现实秩序”之间建立系统的对应,更不可能由理解“本质的”图书馆推断对“现实的”所有图书馆的一致性理解。例如,现实中的文献引用是十分复杂的。文献的可获得性、语种障碍、意识形态、心理因素、身份背景等等,都有可能构成引用行为的特例。没有理想的、必然如此的文献引用,只有现实的、可能如此的文献引用。同样,没有绝对的文献收集、标引和检索规则,只有相对的文献收集、标引和检索规则。更进一步,没有游离于文化的同质化的图书馆实践,只有基于语境的差异性的图书馆实践。总之,任何图书馆现象都存在一个文化语境支点,“此人、此时、此地”与“彼人、彼时、彼地”的图书馆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地存在同一性和通约关系。这就提醒我们,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固然应该努力构建普遍性的“铁的”必然规律,但也需要直面图书馆现象和行为的诸多不确定性,研究基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各种“特例”。

2 图书馆作为文化

2.1 从“文化中的图书馆”到“图书馆作为文化”

“文化中的图书馆”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对图书馆的研究必须放在整体文化中去认识。它从文化整体性功能的高度解读图书馆,难免将图书馆与文化相互混融,甚至导致只见森林(文化整体)而不见树木(图书馆)。此外,恪守“文化中的图书馆”理念,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只是在对图书馆现象作分析之前,首先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或繁或简的介绍;或者先行收集图书馆事实,再分析其社会政治目的,由此得出结论说,图书馆现象与事实之所以会如此这般,是预先注定了的。与“文化中的图书馆”更多地重

视语境和背景的语用式研究不同,“图书馆作为文化”从语义(图书馆本身所积淀的文化意义)着眼,不仅把图书馆当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关注图书馆本身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这意味着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聚焦取向的重新界定,也体现了图书馆学从具体的历史描写方法向文化哲学方法发展的诉求。它要阐释的是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内涵,最终目标是要将图书馆学的专业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普遍理念和基本方法结合起来。

质言之,“文化中的图书馆”是从图书馆与文化合一的整体观以及历史的宏观角度从事研究,旨在揭示社会文化因素对图书馆的前提地位和现实影响,其归宿是图书馆;而“图书馆作为文化”,重在通过对图书馆的透视来观察社会文化,其归宿是文化。

2.2 “图书馆作为文化”的研究内容

图书馆不仅是学术分科意义上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只有立足于图书馆的文化属性,才能真正触及图书馆的精神层面和历史文化内涵。例如,在研究书目时,不能只是对它作为检索工具的形式结构和语法规则津津乐道,认为这些抽象的结构和规则就是书目的本质。诚然,所有的书目都首先表现为一种形式和结构,但任何形式和结构都是主体人根据特定的认知而生成的。没有与之相关的文化观念,它们是不可能产生的。同样,没有自主客体的图书馆,任何图书馆都有独特的文化隐含,携带着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特征。

2.2.1 图书馆能够反映表层文化信息

正式出版(“书”)和公开发表(“文”)的文献是图书馆的主要对象,它们也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文献收集法、图书分类学等图书馆的技术因素突破了具体图书馆所涉文献的有限性而直面人类的所有文献,直接反映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式。例如,《中图法》通过数万个层次有别的类名来表达文化“节点”(范畴)及其关系网络,反映了独特的文化图式。《中图法》的历次修订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则直接反映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分类的变化反映了意识形态控制力的

淡化,而“依人立类”原则的削弱则是民主进步的表征。又如,中国古代书目通过具体文献的著录并将它们条理化而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反映特定社会文化的基本取向。微观层次上,目录之著录、分类、提要等表层结构记录了特定文献的信息,成为特定文化的基本信息显示。例如,《七略》将《蹴鞠》一书列入“兵书略·兵技巧”类,反映了蹴鞠(足球运动的雏形)在汉代的军事训练性质。宏观上,古代目录还将零碎、个别和缺乏联系的文献条理化,形成一个有组织、分层次的系统。通过对众多文献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超越单一文献的整体性结论,展示出特定的文化秩序和规律。书目发展历程的演进,则保存了汉民族文明的历史痕迹。例如,《孟子》一书长期被分入“诸子略”或“子部”,南宋以降,该书被列之“经部”,反映了孟子历史地位的隆升,也反映了孟子心性学说对南宋以后社会文化的现实影响。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记录在文献上的,而文献又是著录于书目的,目录学家将人类认识文献的成果通过书目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目录传之久远。所以,目录在人类文化理解中肩负着很重要的作用。龚自珍《六经正名》曰:“微夫刘子政氏(今按:刘向字子政)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7]表达了缺失目录而可能带来的文化焦虑。总之,书目通过整序文献而显示文化,它涉及到符号(能指)与内容(所指)的语义关系问题,而不只是符号本身的语法结构问题。同样,图书馆的任何结构化特征,都包含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文献收集法也作为符号系统而积淀文化意义,成为一种文化理解和文化表达。例如,乾隆皇帝“广求遗书”和“大收篇籍”既是文献收集行为,也表征“稽古佑文”的文教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是文化被显示出来的重要形式,“图书馆作为文化”的命题,需要我们超越图书馆自身的操作层面,研究图书馆作为文化之符号导向的一般原理、方法和原则。

2.2.2 图书馆能够显示深层文化内涵

图书馆不仅构成文化的表层显示和象征体系,还在更深层次上与文化模式以及思维方式相通约。例如,作为文献整序系统的图书分类,其类名符号与符号所指向的文献之间,存在着

一个文化中介,此符号指称此文献、彼符号指称彼文献等等,必然存在某个“文化理由”。不同的主体意味着不同的理由,因而也意味着不同的图书馆类型和运作方式。总体上,图书分类方式包括两大类型,一是形式化的逻辑编码,如DDC(包括受DDC影响的《中图法》);另一种是非形态化的语义编码,如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书目。古代中国和近现代西方在文化、思想、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最终都可以从各自图书分类的角度得到深刻的说明。例如,中国古代图书分类重视文献在人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可能形成的分组,而不是强调“自然类”意义上的共同属性,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式的形式逻辑并不构成古人的思维特征。可见,图书馆不仅显示文化信息,还是文献表达和文化理解本身,具有文化本体意味。从馆员主体性的角度看,确立文献之收集、整理和保存的某种具体方式,是特定文化选择的结果。至少在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科化”完成之前,世界各民族的图书馆是千姿百态的,图书馆的本质极其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的本质。比如,作为“全文的高度浓缩”、“包含着几乎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GB7713-87)的摘要,其本质是认为所有文献都能够进行“客观”处理;而中国古代以“知人论世”为主要特征的提要(亦称叙录、解题),本质上强调文化回归主体尺度的必要性和可能向度,两者反映了中西方不同馆员主体的不同文化追求。正像“摘要”和“提要”一样,图书馆技术根据馆员主体的不同定位完全可以导致大异其趣的设计,那些被我们视为必定和当然的图书馆技术也许在发展取向上存在根本性的其它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不同图书馆所表征的不同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科学”图书馆的样态不加区别地视为图书馆的“普遍现象”。

总体上,当把图书馆视为一种与现实文献和文化世界相隔离的抽象活动时,必然重视纯粹的文本研究,技术含量较高的操作技术(如DDC)将受到格外重视,而技术含量较低的技术(如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则不被重视。这时,图书馆学研究往往以完善技术为取向,甚至直接成为技术研究。而“图书馆作为文化”,意味着图书馆被视为整体文化的一分子,图书馆现象

的内涵因而具有了开放性和外向性,图书馆将不因其技术性含量的多寡而有高下之分,甚至低技术含量的图书馆反而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受到格外关注。

3 图书馆的文化功能

3.1 从“图书馆作为文化”到“图书馆的文化功能”

“文化中的图书馆”强调特定文化背景对图书馆具有前提地位和本质影响;“图书馆作为文化”强调图书馆能够反映和显示文化背景信息,两者从相辅相成的角度揭示了作为text的图书馆与作为context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彼此同构和相互映射的关系以及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它们都只是把图书馆视为文化的被动产物。“图书馆的文化功能”的命题,重点强调图书馆对于文化的能动作用,要思考图书馆作为手段,如何影响和改变现实文化,而不是停留在对现有文化的总结、肯定和消极默认的水平上。

文献信息先于图书馆而存在,图书馆工作首先必须面向现实存在的文献世界。但图书馆一经产生,它和文献信息就不再表现为单纯的本源和派生的关系,而是走向了意义的自我生成。馆员主体借助文献工作创造出了合乎需要的理想观念,使人的文献活动有了预设性和应然维度。它直接指向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改变和重塑,从而凸显了图书馆之于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反向能动作用。例如,分类表就是知识的体现,而不仅仅是物化的工具。同样,文献采集技术也是内在于人的某种知识,是人根据理性认知而生成的技术。收集什么和回避什么、对特定内容的文献如何分类、给特定文献拟写怎样的摘要或解题等等所有图书馆的技术,无不促进、强调或放大了某些文献信息内容,同时又抑止、削弱或缩小了另一些内容。认为图书馆在文献和文化活动中“十分被动”和“默默无闻”,那是极大地误解了图书馆的本质,也无助于确立图书馆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真正地位。

3.2 “图书馆的文化功能”的研究内容

图书馆对文献的深度介入以及文献对图书馆的主动趋附,确证了图书馆能够反作用于文

献及其背后的文化,这表现在图书馆能够以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评价标准干预文献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接受和理解的每一个过程。

3.2.1 图书馆改变了文献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图书馆重塑了文献的外部环境,为文献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条件,成为文献生产和存在的依据之一。在此背景下,文献也积极向图书馆这个强有力的信息系统靠拢,力争以图书馆认同的方式获得图书馆的身份指认。例如,文献在版编目信息以及论文摘要和关键词等技术规范的畅行,都与图书馆意义上的广义信息存储和交流有关;引文和注释规范的背后则有情报学理论的支撑。而且,文献外部技术的改变必然导致文献内容的改变。例如,“技术规范重视实证,于是,文献内容也在绝对的知性追求中,构建了‘技治中心’(tech-oriented)的标准,直接导致了学术成果中人文精神的缺失”^[8]。显见,图书馆从形态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改变了文献的生产规则,直接导致了文献生产格局的变革和重组。同样,传播不仅仅是文献的真实传递,也是信息的改造和知识的变形。图书馆通过虚拟实践(分类表、解题、书目导读等)改变了文献信息的存在状态。例如,近现代导读书目就直接影响到了传统经典的命运^[9]。总之,随着图书馆获得更多的文化话语权力,必然会形成对文献生产的反向“过滤”,决定文献“适者生存”的标准。文献也理性地认同图书馆对自身的塑造,积极选择为图书馆所接受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就是图书馆“给定的”结果,离开了图书馆,文献信息存在的确定性就会大打折扣。

3.2.2 图书馆改变了文献的认读方式和接受方式

与文献的生产和传播一样,离开图书馆的文献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是“徒劳”的。所以,古人才会提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目录学者,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之类的命题。图书馆是构建文献世界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文献的本质是其承载的文化。图书馆对文献的重塑,本质上是介入了文献背后的文化,直接影响甚至改变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图书馆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物理存在,而是作为被人整合的中介直接影响到主体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但具体的运作理念与运作方式则更多的是以图书馆自身的模式进行的。例如,书目词汇的选择对文化的影响甚大。比如,1904年徐树兰在《古越藏书楼书目》中使用的“生理学”、“物理学”、“哲学”、“法学”、“教育”、“工业”、“美术”等词汇,既是新类名,也是新思想。可以肯定,词汇指称的变化就是文化表述和文化认知的变化。此外,旨在组织和支配外部词汇结构的语法也与思想息息相关,语法的改变更能表征文化表述和文化认知的改变。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DDC的全面接受,不仅意味着标引和检索工具的变革,也是对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确认。它既能够消解已有的文化观念,又能够操纵人们对新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对文献和文化认知的转型:文献不再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相反,它们只是立于我们面前的纯粹客观之物,可以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物理形态上予以打量”^[1]。显见,社会文化的变迁往往就是图书馆运作模式的变迁。反之,图书馆运作模式的变化也是社会文化的变化,图书馆以自己的方式引领文化,仿佛是牵着文化走。

3.2.3 图书馆能够规划人类文化的应然目标

图书馆改变并重塑了文献和文化世界,因而能够从应然的角度预先把未来文化的发展带入它的独特视界,为人类文化指明应有向度。目前,西方图书馆学业已取得独步中西的地位。作为“泛理性科学”的西方图书馆学,以“知识论”为取向重塑了人类文化。所谓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10]。于是,图书馆学在学理上信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命题;在操作上主张从文献的学科属性及其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出发对文献进行编码和标引,并确立“标准化”在文献工作中的绝对地位等等。这些信念和操作都维护了“知识”的基本特征:重视事实与经验,即必须经过观察或实验的验证;合乎“合理的判断”和“系统的阐述”,即必须能整合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图书馆的模式化导致文化塑造方式的模式化,强势的西方图书馆学的“知识”尺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成为人类文化的生产、传播与利用过程中的基本规范,人类文化甚至就是为了贯彻基于西方图书馆学的前见性意志而被生成出来和被理解出来的“知识”。波普尔说:“科学知识就属于这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11]不管有意无意,西方图书馆学都在将有形的文献及其背后无形的文化按照知识论取向作标准化重构,非知识取向的文献和文化则在图书馆的名义下面临着改造。然而,知识论单一向度的实质是认为“知识”构成了人类心智和人类文明的唯一内容,它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因而,解蔽西方图书馆学模式也是解蔽“知识论”模式的必由路径之一。首先,文化大于知识。立足于文化的图书馆学应该将研究重心从文献背后的知识传递转移到文献背后的文化传承上来,由此形成下述两个具有前导性(而不仅仅是反思性)的命题:文献是记录有一切“文化”的载体,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记录合乎“合理的判断”和“系统的阐述”的知识;一个人既要掌握“知识”,还要涵养自己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和品格德性。无疑,一旦图书馆学完成了从“知识”到“文化”的转向和自我证明,也将能够在批判“知识论”的基础上,引领人类文明走出“知识论”的泥沼,迈向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其次,智慧高于知识。图书馆学的尺度应该能够成为我们审视人类行为、精神和信仰的独特标准与内容,甚至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也要深受图书馆学的影响。拙作《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12]专申此论,兹不赘述。

4 结语

文化视角的图书馆学研究从作为 context 的外围语境着眼,不涉及作为 text 的图书馆自身的形式特征和结构规律等问题,也不能解决文献编码(标引)和解码(检索)的相符性这个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学视角固然拓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改变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单一化思路,但由于学科建设并

不是它的研究目标,所以不可能代替图书馆学自身的研究。总体而言,图书馆既是物理实体,也是文化本体和精神范畴。作为物理实体,图书馆学只有从语法层面上充分研究图书馆的形式特征和结构规律,才能生成图书馆学自身的独立和自足的学术理论。作为文化本体和精神范畴,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基于语义和语用层次的文化视角的有效介入。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既能充分调动文化因素,又能把握图书馆的本体内容,两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 [1] 李满花. 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2): 4 - 8, 92.
- [2] 黄俊贵. 明确图书馆本质 体现图书馆本质: 从“图书馆”定义说开去[J]. 新世纪图书馆, 2006(4): 3 - 6, 11.
- [3] 李满花.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 概念、原因和内容[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10): 29 - 32.
- [4] 范并思. 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235.
- [5] 罗素. 人类的知识[M]. 张金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9 - 11.
- [6] 孟广均, 徐引麓.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72.
- [7]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王佩诤,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7.
- [8] 傅荣贤.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需要适度颠覆技术规范[J]. 人文杂志, 2009(1): 187 - 190.
- [9] 王余光. 推荐书目与传统经典的命运[N]. 中华读书报, 2008-04-23(18).
- [10]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铨,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95 - 196.
- [11] 卡尔·波普尔.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 范景中, 等, 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6: 419.
- [12] 傅荣贤.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 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J]. 情报资料工作, 2009(1): 6 - 10.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通讯地址: 哈尔滨. 邮编: 150080.

(收稿日期: 2010-01-24; 修回日期: 2010-02-09)